第一章　温州现象

温州历史上是个手工业城市，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通商口岸。宋代，温州的手工业和小商品出现过昌盛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温州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后来，由于某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温州较长时间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广大农民温饱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投资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条件下，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力量，使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百万温州人走向市场，城乡经济出现了蓬勃生机和罕见的活力，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治穷致富之路。人们称这些变化为温州现象。

第一节　东瓯名镇

温州地处浙南沿海，北邻台州，西接丽水，南与福建省交界，东濒东海。全市总面积1.17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占78.2%，平原占17.5%，江河占2.8%，海岛占1.5%。温州1981年实行市管县体制，下辖永嘉、乐清、洞头、瑞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8县（市）和鹿城、瓯海、龙湾3区，1997年全市人口708万人，其中市区人口104万人。

温州历史悠久。远古时代，这里就居有原始瓯人。温州各地发现的石奔、石镞、石刀、石斧、石犁、石凿等劳动工具和历史人物，标志着温州在4000多年前，已具有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夏、商、周时，温州称瓯 （沤），春秋后期，越王勾践灭吴后，温州成为越周辖地，春秋战国时期温州称越。西汉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 年），越王勾践第七世孙驺摇反秦佐汉有功，被封为东海王，建立“东瓯国”，定都东瓯（今温州市），温州始为封建诸侯封地。

温州由于手工业和商贸业发达，有许多手工业商品驰名中外，故称“东瓯名镇”。温州作为“东瓯名镇”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很早被辟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商口岸，同世界各国有频繁的商贸往来，国内外商贸业在历史上曾出现过鼎盛时期。东汉永和三年（公元 138 年），温州开始建县，当时称永宁县。东晋太宁元年（公元 323 年），温州开始设立郡治，当时称永嘉郡。开始建设温州古城，相传建城时有白鹿衔花而过，故称“鹿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 65 年），改郡名为温州，因“隆冬恒糗”而得名。温州全市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暖夏凉，雨量充沛，故称温州。南宋后期，称瑞安府，明、清时称温州府。

东汉之前，温州还是地广人稀，户不满万，三国东吴建立后，对温州进行经济开发，温州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人口也逐步增加起来。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因战争和灾荒，广大农民相继南迁，加上晋王室南移，北方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到南方，温州因靠近京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当时，温州城郊桑园连片，一年可养八次蚕，称“八辈蚕”。手工业方面，陶瓷业较为发达；“东瓯窑”生产的缥瓷，闻名全国。

晋时著名学者郭璞、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温州活动。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文学家颜延之、文学家裴松之先后担任过永嘉郡太守，留下丰硕的诗文墨迹。这些名流学士的活动，对温州文

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隋唐时，温州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农村开河筑塘，兴修水利，灌溉粮田，开始使用粪肥，实行“区田法”等生产技术。温州盛行土布生产，“夜浣纱而且成布”，被称之为“鸡鸣布”沿海一带开发盐田生产，瑞安还开始铜业生产。同时，开展了同日本国的民间贸易，且日益频繁。

宋朝，温州的商业和手工业达到鼎盛时期。特别是宋王室南迁之后，温州的海外贸易、商业和手工业蓬勃发展。在农业方面，水稻、柑桔、蚕桑、茶叶、油桐、木材等种植业均相当发达在手工业方面，陶瓷、造船、造纸、雕刻、漆器、刺绣、制伞、皮革及绫、绢、绸等纺织业都闻名全国。温州“蠲纸”以细腻纯净、莹润洁白、耐磨无痕、纸寿特长而著称。温州漆器居全国第一，在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设有“温州漆器铺”，堆漆雕饰艺术水平很高，能雕堆飞鸟、走兽、花卉、佛像，显得非常雅致秀丽。温州的造船业，更是名列全国前茅。北宋初期全国官场造船 2916 艘，其中温州造船 125 艘，占 4.3%。宋哲宗时，温州造船 600 艘，居全国首位。温州所造的大多是战船、漕船、使船（出国船）及供官家使用的大型游览船，由此可见当时温州造船业气势之盛，技术之精湛。其间，民间私营造船业也比较发达，大多以制造商船为主。

农业、手工业、造船业、运输业的兴旺发达，有力地推动温州外贸和内贸业的发展。北宋咸丰二年（公元 999 年），温州和临安（今杭州）、明州（今宁波）先后被朝廷辟为对外贸易口岸。温州除出口漆器、瓷器、刺绣等工艺品外，还出口清心堂、丰和春、蒙泉、碧露等名酒。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 1132 年），温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和发展海外贸易。开设“待贤驿”、“来远驿”，以接待外商和使者。开设“八仙楼”，宴请各方

宾客。当时温州有商船前往高丽（朝鲜）、真腊（柬埔寨）等地，外商来温贸易也很多。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 1145 年）十一月，就有 19 名男女商人携带硫磺和布匹来温州贸易。诗人徐照在他的诗文中所提及的“重见日东人”、“僧多外国人”，是对当时外商来温贸易的如实写照。

除海外贸易外，温州商船还经常出入我国沿海各港口城市，各港口城市的商船也纷纷聚集温州。方鼎锐在诗中写道：“漳泉大贾飞樯集，粤海奇珍巨槛来”。当时的温州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市行遍地，贸易发达，生意兴隆。城乡河道密布，交通运输方便，温州以“其货纤靡，其人多贾”、“鱼盐充牣，商贾辐辏”而闻名全国。仅酒税一项年征收额达 5 万贯以上。北宋温州太守杨蟠的诗句“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描述了当时温州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盛况。

元、明、清时，温州工商业时兴时衰，陷于相对停滞状态。元灭南宋时，温州经济在战乱中遭受破坏。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元朝统治者提倡“以依桑为急务”，温州召集楠溪山寨归农者三万余户，又召集瑞安县逃移之民十万余户，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及染织业比较发达，漆器、刺绣、皮革等手工业有较大发展，造船业也相应得到发展，平阳矾矿也开始开采。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 年），温州恢复设置“市舶司”，成为元代我国对外通商贸易的七大港口之一。到了元末（公元 1348 年），温州发生大海啸，先后又遇上大水，许多农田颗粒无收，加上战乱不息，工农业生产遭受破坏，商业萧条，出现“民相枕死”悲惨景况。

明代初期，官方实行海禁，温州海外贸易处于停顿状态。明代永乐年间（公元 1403—1424 年），海禁开放，温州工商业开始复苏，其间，瓯绸生产发展较快。明朝万历元年（公 1573

年），温州设立织染局，派官监造宫廷所用丝织品。明末，温州民间生产工艺精巧的“十字花布”和“瓯绸”也远销海外。

清代，从顺治至道光的两百多年间，由于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温州经济相对停滞不前，失去了唐、宋时期兴盛繁荣景象。

清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至 1919 年的四十多年间，是温州工商业发生重大变化时期。一方面，世界列强利用“通商”掠夺中国，加上清王朝的无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地位；另一方面，温州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的竞争刺激之下也日益发展起来。

中美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辟为对外通商的商埠，列强各国领事、商人、传教士纷纷涌入温州，英、美、法、德、日等国在温州开设大批洋行，由美国执掌税务大权的“瓯海关”也开始设立。到了 1900 年，温州已变成“瓯为海国，市半洋行”。由于洋货的大量输入，冲击了温州的民族工业，使温州经济沦为半殖民地性质。同时，温州的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的竞争刺激下开始发展。

温州的现代工业发轫于 20 世纪初。1919 年“五四”运动后，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下，温州的纺织、化工、食品、轻工等工厂纷纷建立。1926 年，全国第一家炼乳厂——百好炼乳厂在温州创建，实业家吴百亨在与美国商人竞争中以产品的优质取胜。1929 年，擒雕牌炼乳获得中华国货一等奖； 1930 年，获西湖国际博览会特等奖。1939 年，吴百亨还创办西山瓷器厂，其后，又创办了温州蛋粉厂、百好酿造厂、中国罐头厂、西山造纸厂等企业。

其间，温州的皮革工业有较大发展，市区出现制革街、皮鞋街、皮箱皮件街，作坊星罗棋布，商店林立成市，前店后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分昌盛，形成了手工制革业的完整体系据 1932 年统计，市区有制革厂和皮鞋、皮箱店 60 家，拥有 38．4 万元资本，年产值 80 万元。产品销往上海、福建、东北、西北、华北和港澳地区，并远销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草席业和纸伞业也有长足的发展。 1919 年郑采臣在市区蝉街创办中一席厂，从此草席生产迅速兴起，到 1927 年先后有 35 家草厂相继开办，草席产量达 700 万—800 万条。在广大农村还出现一批草席乡和草席村。纸伞是温州主要手工业产品之一，1926 年获美国费城赛会一等金质奖。 1935 年，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玉环 6 县生产经营纸伞的工厂商店就有 107 家,年经营额为 77.9 万元。

随着工业的发展，商业市场也日趋活跃。温州商船频繁往来于上海、宁波、乍浦、石浦、海门、泉州、福州、厦门、汕头、台湾等地。绸布、南北货、中药材、酱、酒产品成为当时温州商业的四大支柱商品。市区金三益的绸缎产品，五味和的槽、醉、腌、腊商品和蜜饯制品，叶同仁、乾宁斋的中药材，均誉满城乡。

为了同外商洋货开展竞争和较量，温州民族资本家创办新型商场和公司。1926 年出现许云章、博瓯等大商场。 1934 年，开办了温州中国国货公司。在大商场、大公司的带动下，温州出现一批专业街，如东门行前街的钱庄，虞师里的颜料号和洋纱号，五马街新街的中药栈，府前街的书店、照相馆和时鞋店，大南门的水果行、豆麦行，朔门头大街的鱼行，西郊的木行，打蓬苍和永宁巷的山货行，象门外的木碳、竹行等等。此外，温州手工业产品有了新发展，瓯绣作为东方艺术品进入欧美和南洋市场，温州剪刀驰誉全国，外销东南亚，烟花爆竹产销两旺。到 1936 年，温州工商业的行业门类已比较齐全。

抗日战争时期，温州工商业一度繁荣。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市客商及采办军需物资人员汇集在温州，当时温州港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温州商贸业盛极一时，1938 年港口吞吐量达 80 多万吨，比抗战前的 1930 年增长二倍多。1940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2707 万元。其间，新建了一批新兴工商企业。但好景不长，随着温州的沦陷，工商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温州工商业一蹶不振，温州处在动荡不安、风雨飘摇之中。

“东瓯名镇”的手工业和商贸业的发展历史表明，它同国家的港口开放政策和振兴工商业政策休戚相关。每当国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扼杀工商业政策，温州的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就衰败停滞；每当国家实行港口开放政策和扶持国内商贾政策，温州的手工业和商贸业就兴旺发达。

第二节　发展起伏

温州从 1949 年解放，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的看温州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经历了一个“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

温州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也有产业结构的原因，更重要是“左”的路线的干扰。在自然条件方面，温州地少人多，土地资源比较缺乏，1978 年，人均只有 0.4 亩土地。在地理位置方面，温州地处海防前线，面对台湾，国家在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很少在温州投资。从 1949 年至 1981 年的 30 年中，国家对温州固定资产投资共计为 6.55 亿元，平均每年只有 0.2 亿元，不及同期国家对毗邻一个地区投资的四分之一，这明显制约着温州经济的发展。　1957 年，温

州与宁波的工业总产值旗鼓相当，从此之后，差距不断拉大，到1980年，温州工业总产值只有宁波的41.79%。在产业结构方面，是‘小、轻、低、散”,小商品多,轻工产品多,低档次产品多,企业分散，上规模集团性企业少，这样的产业结构，制约了温州经济发展。

再是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是温州经济发展缓慢滞后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导致温州经济“三起三落”的根本性原因。

“一起”是1949年至1957年，是温州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温州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7年“一五”建设计划结束，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8.26亿元,比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3.23亿元增长1.56倍；年递增12.45% 其中工业产值2.6亿元，比1949年0.68亿元增长2.8倍,年递增18.25% 农业产值5.66亿元，比1949年2.53亿元增长1.37倍,年递增10.05%。温州港口吞吐量由20.69万吨增加到167.48万吨，增长7倍多，年递增29.87%。

“一落”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扼杀工商业和集市贸易活动，个体工商业被停业，集市贸易市场被关闭。贯彻“以粮为纲”，批判“弃农经商”，反副业“单干”，农村家庭编织业一扫而光，再生布销声匿迹，年工业产量直线下降，市场店摊大幅度减少，温州经济明显滑坡。

“二起”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至1965年。贯彻“调整、整顿、恢复、提高”八字方针，温州专署作出恢复集市贸易的决定，允许社队和农民家庭工业产品在集市上交易，允许手工业者独立经营，允许前店后厂生产经营方式。全区家庭工商业又得到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和市场贸易全面回升，农村工业和城镇街道

工业也得到复苏。1963年全区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460万元,比1961年增长51.6%。

“二落”是“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使温州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以大批判开路，视商品经济为“复辟资本主义温床”，把发展家庭工商业，允许集市贸易活动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不顾生产力水平，鼓吹“穷过渡”，提倡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全区社会生产急剧下降，商业和市场贸易遭受严重打击，城乡企业停工停产，交通运输瘫痪半瘫痪。1966年至1976年，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只有0.5%，温州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三起”为“文革”后期，国有企业停工停产，市场商品供应不足，这给家庭工商业和集市贸易提供一个发展的机会，温州家庭工商业和个体商贩在夹缝中悄悄地发展起来。在温州全民企业办集体企业，大集体企业内部办小集体企业，促进了集体工商企业的发展。城市技术工人的下乡，促进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1977年，全区农村社办企业工业产值4004万元，比1971年提高81.3%；同期，城市街道工业产值3054万元，比1971年增长一倍多。

“三落”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后的头两年。“左”的思想尚未肃清，仍然把温州发展个体工商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把发展商品生产看成是搞资本主义，把从事经商活动看成是不务正业，把跑供销看成搞歪门邪道，把长途贩运看成投机倒把，把私人工厂说成“地下工厂”，私人商店说成“地下商店”，私人搞运输说成“地下运输队”，私人承包建筑说成“地下建筑队”。从而提出“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围剿小商贩，取缔家庭工商业和集市贸易，使温州城乡经济重新陷入困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温州经济“三起三落”一条根本原因，是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传统的理论，把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世界的实践包括中国的实践一再表明，资本主义可以避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可逾越。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到现代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阶段不可超越。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早认识、早发展，早主动；不认识、不发展，就被动。由此，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的原因。

第三节　最低有效启动点

在国家投资少、集体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能不能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如何起步？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回答了这些问题，用温州群众的话来说，就是“一辆车子，两个轮子”起步。“一辆车子”，就是发展城乡的商品经济；“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发展家庭工业；另一个轮子是发展专业市场，为家庭工业提供原材料和产品销售渠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为中国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创造了现实性前提条件。温州农民把农业家庭经营方式延伸到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了农村家庭工商业，找到了发展农村工商业的无痛分娩法，这也是广大农民的一个创造。发展农村工业，采用家庭作坊式生产，这在生产方式来说，是最低的，但是非常有效，具有低启动高效益的优点。这是初始阶段起码形式，是小商品的简

单生产，生产水平低，容易上马，加上温州人商品意识强，能工巧匠多，又有一支善经销的供销员队伍，商品经济很快在广大城乡启动起来。最低有效启动点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小而专的分工和大而全的协作相结合，这是最低有效起动点最关键最具特征性的优势。把家庭工业小而专的专业分工和大而全的区域性协作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形成整体的生产经营网络。温州农村工业的一乡一品和一村一品，一个乡村具备了生产这种产品的全部条件，而每个家庭根据自身的劳动技术和资金设备条件，只生产该产品的一、二道工序，许多半成品介入到市场交换关系之中，通过市场联系，小规模和大批量结合、个人生产和社区群体协作的结合、一家一户看得见的点和一个乡村看不见的面的奇妙结合，形成隐形的社会化大企业。如宜山区再生腈纶生产基地，是一个连续性分工协作的隐形大生产基地。全区从事再生腈纶纺织业有 16000 户，其中分拣原料的有 600 多户，梳棉弹花的有 1200 多户，纺纱编织的有 6400 户，从事缝纫有 2900 户。生产再生腈纶产品，从原料分拣到织成腈纶衣裤共分 10 多道工序，如分拣、开花、梳棉、纺线、编织、缝纫等，每个家庭只从事其中的一、二道工序。乐清市柳市区低压电器生产，其专业分工协作区域则更大，由翁洋乡的千家万户生产矿灯配件，茗东乡的千家万户生产电器配件，湖头乡的家家户户生产胶木配件，柳市镇每家每户进行组装而成的。还有两县之间的区域分工协作，如瑞安市塘下镇生产的塑料拉丝及拉丝机械，为平阳县肖江镇编织袋生产提供原料和生产设备，这一切都是通过家庭与社区的分工协作来完成的。

温州农村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是通过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联结协调运作的，不是通过行政机构的指挥来运作的，免除了瞎指挥的干预，减少了企业管理费用，同时，他们彼此以平等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份在市场中交换自己的劳动，不受手工业资本家的盘剥和支配。这种家庭经营方式，有利益驱动的原则激励，而无工头皮鞭的威胁，有社会主义原则保护，而无官僚主义的干扰。温州家庭工商业激起的生产积极性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劳动工人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吃大锅饭的传统国有工业工人难以比及的。温州家庭工商业运作方式，既符合分工协作的经济学原理，也符合个人物质利益驱动的社会学原理，更符合商品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温州农村这种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无形大工厂，其规模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农村社队企业，这种席卷整区整乡千家万户的广泛普及性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农村社队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温州家庭工业小而专的分工和乡镇区域大而全的协作的生产方式和环环通过市场的流通方式结合起来组成经济网络，用最快的速度向乡、镇传递辐射开来，很快形成气氛，发生群体效应。温州这种生产方式既吸收了社会主义公平性的优点，又吸取了市场经济的效率性优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发展城乡经济的模式。

温州这种生产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工业生产方式：（1）分工方式不同。中外传统的家庭工业是小而全的家内性别分工，如英国工业革命前的女纺男织，中国传统农家的男耕女织。到了工业资本家兴办手工工场时，分工协作才发展到比较完善的程度。而今日温州的家庭工业其分工协作一下子就达到历史的较高程度。（2）劳动手段不同。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以手工劳动工具和生物动力为主，而温州今日的家庭工业以机械化、半机械化和电力动力为主。如瑞安市仙降镇用自动化注 塑机生产塑革鞋，宜山用 37000 台纺织机械生产腈纶衣裤，平阳县拥有近百条生产编织袋的生产流水性机械，这是后进工业化地区借用先进适用技术的结果。（3）家庭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不同。传统家庭工业是依附于农业的副业，在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中以农业为主，产品以农产品

的粗加工为主，产品以销往附近地区为主，是一种自给半自给经济；温州今日的家庭工业摆脱了对农业的依附地位，成为乡镇和农户家庭的主业，产品以日用小商品为主，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经营的目的，是一种初级的，然而又是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二是不占用耕地的优势。采用温州现在兴办的家庭工业生产方式，除少数产品和少数工序需要新占土地外，多数产品和多数工序可在农民家中生产，既节省了土地征用的投资，降低生产成本，又可节省大批耕地。根据我省调查，乡村办集体工业，每 10 万元产值需要占用 1 亩左右耕地，一个年产 10 亿元的工业强镇，就需要 1 万亩耕地。温州采用家庭工业生产方式，以节省 70％耕地计算，一个年产 10 亿元的工业强镇，就可节省土地 7000 亩。中国人多地少，全国人均不到一亩半土地，如果农村实现工业化能少占耕地，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最低有效启动点的有效性具有深远意义。

三是修旧利废、再生产业优势。修旧利废、再生产业在人类社会有限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温州农村的“最低有效启动点”通过修旧利废、再生产业实现了低成本和高效率。修旧利废、再生产业是有人不愿干、不想干的产业，温州人冲破传统观念中的某些禁区，把它作为最低有效启动点对待，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瑞安市仙降区利用 50 万吨废塑料生产塑革鞋；苍南县金乡镇在近 3 年时间用 2000 多吨钻边角料制徽章；宜山每年利用腈纶边角料 1700 万公斤，相当我国南方 34 万亩棉田的棉花产量，每年生产的再生腈纶衣裤 1.5 亿件，再生布 300 多万匹。此外，一些乡镇还利用铁皮边角料、矽钢片废料、废旧钢材等，开辟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利用原料的新天地。

四是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温州

人均只有0.4 亩耕地，在沿海乡镇人均只有 0.3 亩土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在温州显得非常突出。温州在改革初期，全市有 290 万亩耕地，188 万劳动力，在机耕电灌的条件下，每个劳力可耕 5 亩地，全市农村只需 60 万劳力，全市农村剩余劳力高达 120 万人。如何解决温州城乡大批剩余劳力的出路问题，是温州的一大难题。

据调查，从 1979 年到 1985 年，六年内全市家庭工业安排了 34 万多个农村劳力，为家庭工业服务的供销、运输、信息、饮食等行业有 25 万多劳力，合计安排劳力 60 多万人，占全市剩余劳力的50％。温州这种安排农村大批剩余劳力的方式，从国家来看，没有出钱付出代价，这种有效启动点是崇高的。英国工业化付出的代价，通过圈地运动把破产农民赶出家园，实际上是用农民的血泪来偿付的。而温州农村工业化的代价，是用农民摆脱贫困的笑声来偿付的，这种有效性同旧日是不可比拟的。

温州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用农民自我教育的自强不息的方式造就了一支农村工业队伍。温州的家庭工业是一所农民自我教育的伟大学校，无论是业主还是雇工，都在学习生产技术和经营本领，农民自觉地向科学技术进军，他们或是引进技术人才，或是外出学习取经，或是自己组织培训，或是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挂钩协作。这样，农民自身把农村劳力密集优势与科技智力密集的成果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这支工业队伍的成长。在柳市，懂技术、善经营的人才占总人口的28.5％；在瑞安市塘下镇，有65％的劳力拥有一技之长。温州这种生产方式能在家庭工业基础上有效促使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化，这对经济和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意义。温州通过这种自我教育、自我转化的方式，把人类社会最宝贵、最富活力的资源——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去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这个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五是对国家的无本万利优势。温州农村家庭工业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专项拨款，不要国家一个招工指标，也不用国家的调拨物资，却对国家的财政税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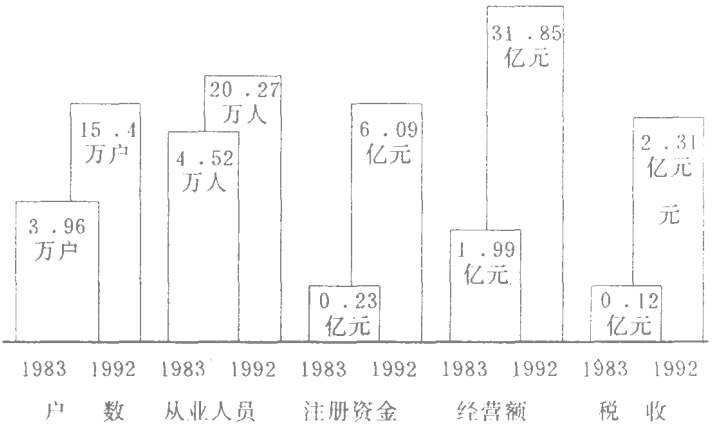
自1983年到1992年的10年中，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增长2.88倍，年递增14.5%；从业人员增长3.48倍，年递增16.2%；注册资金增长25倍，年递增38.6%；营业额增长14.5倍，年递增31.4%；税收增长17.9倍，年递增34.1%。税收增长的倍数和年递增率超过营业额增长倍数和年递增率，详见表1和图1。

表1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发展和上交税收情况对比(万元)

年份	户数	从业人员	注册资金	经营额	其中工业产值	税收
1980	1844	1584	39	426	1	—
1981	13231	14587	295	1419	38	—
1982	20363	23838	437	7252	204	33
1983	39698	45228	2331	19979	642	1223
1984	100286	117192	4846	44767	7921	2310
1985	130407	156726	11595	85700	22228	4365
1986	138384	169473	15592	89325	17866	5804
1987	145224	180342	19655	139891	28787	6352
1988	146622	183752	28514	195916	46064	9283
1989	141725	179681	37714	218714	68598	12119
1990	156652	197396	42344	220070	86555	15783
1991	153582	195579	44457	258780	101394	20308
1992	154044	202723	60987	318514	104946	23135

从财政观点看，这种不要国家一分钱的生产方式，实现国家对企业的无本万利的最低有效启动点，是人民群众的一种发明创造。

图 1 10 年中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发展情况与上交税收情况对比



六是温州生产方式的有效性在于小商品取向，具有低能耗优势。传统的农村手工业以农副产品粗加工为取向，以“三就四为”为原则。温州农村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以生产日用小商品为主，原材料和产品销售都已向全国，突破原来“三就四为”束缚，交换半径长达一二千公里。生产的小商品有钮扣、徽章、标牌、塑片、编织带、松紧带、塑革鞋、童鞋、皮鞋、再生腈纶衣裤、低压电器配件、汽车配件、打火机、胡须刀等，是这种最低有效启动点的具体体现。

小商品生产有它自身的优势。小商品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价廉物美销路一般不成问题。小商品一般以薄利为特点，而大中企业不屑一顾。温州农村具有家庭工业的小而专分工和乡镇区域大而全协作，正符合小商品生产的要求。温州小商品能形成全国性的大市场，还在于小商品种类繁多，品种品系齐全。采购员跑一个温州小商品市场，就可采购到自己所需要商

品。温州许多小商品就单体利润来说，以分厘计算，赚得是批量的钱，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温州的家庭工业相对来说，具有低能耗的优势。温州的家庭工业多属“无烟工厂”，除陶瓷工业外，一般不用煤。对电力的使用，其耗量也是较低的，许多工序是电力、人力两用的，适合农村电力不足的特点。在金乡生产的“四小”商品，生产每万元产值的商品耗电仅 510 度。在目前能源紧张、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温州农村兴办低能耗工业，也是温州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一种创造。

七是温州家庭工业的最低有效启动点，还表现在竞争力的有效性上。温州的强盛竞争力不仅表现在价廉物美上，而且表现为产品转产调头快，应变能力强。

家庭工业规模小，船小调头快。家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集生产、经营、决策于一身，对市场变化敏感力强，市场产品价格变动直接牵涉到家庭工业的利益，因此，应变自如，适者生存。不像有些国有企业，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企业连年亏损，奖金依旧照发。即使实行改革措施，还有条条制约，块块掣肘，政出多门，议而不决。家庭工业没有国家的父爱保护，也没有什么包袱可背，运转机制小巧、经济，启动点最低，决策高度集中灵活，自由度最高，一旦发现市场销售情况起变化，短至几天之内，长至三个月，企业顺利实行转产。温州这种以销定产，边销边产，加速资金周转率，是一种快速运转机制，加上快速转产机制，是最低有效启动点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八是温州的最低有效启动点综合性表现是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大面积治穷致富。温州 1949 年解放，到 1978 年整整是 30 年时间，农村并没有改变 80% 的人口搞饭吃的落后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农村的产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